

临高语研究

梁 敏 张均如 著

11201/23

上海远东出版社

序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多语言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持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政策,历来重视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为此从 50 年代开始,国家就组织了大批人力、物力和财力,对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广泛和深入的调查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发现了不少新的语言。五六十年代的语言调查成果,曾作为国家六五重点项目写成《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列入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于 1980~1987 年正式出版。

80 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促进了民族语文事业新的繁荣和发展,也为民族语文研究工作者开拓了思路,提供了机遇。在此期间,民族语文研究工作者深入边疆、山区、海岛,又陆续发现了一批鲜为人知的语言。这些语言使用人口不多,往往不为人们注意,但它们都具有较高的科学研究价值,尤其是一些使用人口越来越少的语言,急需抓紧时间调查,以保存这些可贵的语言资料。为此,我们从 1992 年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社会科学规划机构的支持下,对这些语言逐个进行系统、深入、全面的调查,已经取得了

一批研究成果,并决定以《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的形式陆续出版。

我们认为,新发现语言的系统调查、深入研究与及时刊布,对于进一步了解国情;对于发展语言科学,推动民族语文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对于丰富祖国的文化宝库,繁荣各民族文化;对于深入研究各民族的关系,进一步做好民族工作,促进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和进步,都是大有裨益的。

在编辑出版本丛书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上海远东出版社的指导、支持和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

编审委员会

1996年1月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1
第一节 “临高人”的分布、人口数字和临高语的使用情况	1
第二节 “临高人”的族源、族属和临高语的语言系属问题	4
附：临高先民分布和迁徙图	
第二章 临高语的情况	18
第一节 各地音系	18
第二节 各地语音对应情况	28
第三节 临高语的词汇	36
第四节 临高语的语法	66
第三章 临高语与本语族其他语言的比较	114
第一节 语音比较	115
第二节 词汇比较	189
第三节 结语	192
附：海南省临高语土语分布图	
附录：一、词汇	195
二、长篇材料	298
本书参考资料	330
后记	332

第一章 导 言

第一节 “临高人”的分布、人口 数字和临高语的使用情况

临高语是汉藏语系侗台语族台语支中与壮语比较接近的一个独立语言。它使用于我国海南省北部地区——东起琼山县的南渡江,西迄临高县的新盈港,南以琼山县的遵潭、澄迈县的白莲和儋县的南丰为界,北濒琼州海峡,包括临高县全境和儋县、澄迈县、琼山县及海口市郊的各一部分。这片地区除横亘着说海南话的海口市和琼山县县府所在地府城外,基本连成一片。说临高语的人一向都没有自己的民族称谓,他们自称 $\text{ʔaŋ}^3 \text{vo}^3$ 或 $\text{ʔaŋ}^3 \text{kaŋ}^3 \text{vo}^3$, 其中的 ʔaŋ^3 是表示人的词头, kaŋ^3 和 vo^3 分别是“讲”和“村子”的意思,合起来就是“村人”或“讲村话的人”的意思。另外,在海南岛西北部的昌感县还有一部分说与黎语相近语言的人也没有自己的民族称谓,他们自称 $\text{ŋa:u}^1 \text{fɔ:n}^1$, 其中的 ŋa:u^1 是“人”的意思, fɔ:n^1 是“村子”的意思,合起来也是“村人”或“乡下人”的意思。用汉语来说,都是“村人”。这两个地方的“村人”过去都自己报作汉族。但实际上他们是说两种不同语言的两个民族。海南岛上的汉族因为这些人的语言、风俗习惯都跟自己不同而未予认同。而且在海南人的心目中,岛上的居民“非汉即黎”,故笼统地把他们都当作是黎族。又因为他们当中有不少人会说法语,风俗习惯也跟五指山的黎人不大相同,所以又称之为“熟黎”。1957年我们在调查这两种语言时,为了便于区别,我们把说昌感“村话”的人称为“村人”;而把临高、澄迈和琼山一带讲“村话”的人称为“临高人”,因为临高县是说这种话的人口最多、最集中的地方。对他们的语言也相应地称为“临高话”(都带引号)。而在本书中,则分别

称为“临高人”(仍带引号)和临高语。如果专指临高县的人和临高县内的话,则叫临高人(不带引号)和临高话或按具体调查点称之为临城话,以示区别。由于“临高人”没有单一的民族成分,故在历次人口普查中没有自己单独的人口统计数字。在我们先后的两次调查中,都得到各县民政部门的鼎力帮助,为我们逐乡逐村地估算、统计。1957年说临高语的约有30万人,据1980年的估计,约有51.6万人。其中以临高县最多,计27.7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91.6%;琼山县次之,有11.8万人,集中居住在该县羊山地区一带,占全县总人口的24.1%;澄迈县有4.8万人,主要居住在沿海的几个乡镇,占全县总人口的10.4%;儋县有2.4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4.1%;海口市郊区7个乡镇共有5.4万人,占郊区人口的72.4%。从1980年至今又过了十余年,即使按保守的估计,说临高语的至少也有60多万人了。

上面所估计的人口数字都是指各县(市)仍然使用临高语的实际人数,那些已改用了海南话的村镇都没有统计在内,所以具有“临高人”血统的人数比上述数字还要多得多。在聚居区内的临高青壮年一般都会说海南话(属汉语闽南方言),但在家乡,他们均以临高语为主要交际工具。在临高县由于临高人的比例高达90%以上,而且各地语音基本一致。所以,人们不但在家庭内部、在集镇、甚至在临高县城和各政府机关里,都用临高话互相交谈和办理公务。1980年我们在临城调查时,住在县招待所,休息时常到县府各机关的办公室串门,了解情况。看到在干部中间大都用临高语交谈,起先我们以为他们都是本地的干部,后来一问才知道,他们中既有本县的干部,也有东路各县原来说海南话的干部,还有解放海南岛时的南下干部(当时他们还没有到退休的年龄)。据他们自己说,不但他们本人,连他们的家属、子女都能说一口流利的临高话。听到这些情况使我们十分惊讶。我们在滇、桂、黔各民族地区跑了不少地方,其中也包括壮族人口占96.7%的广西德靖地区,民族语言在县城和政府机关内使用这样普遍的还真没有。在临高县城和集镇开店铺的外地人也大都会

说一些常用的临高话。我们 1980 年调查时的主要发音人王其斌是东英镇吉地中学的语文老师。他告诉我们，临高县的小学，甚至初中的部分班级授课时用普通话，但一般还得用临高话来讲解。在琼山县、澄迈县临高人聚居区内的情况也差不多。

临高人的口头文学很丰富，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创造了多种多样的民歌和故事传说。在琼山县最常见的民歌形式有“唱么唱”和“哎么哎”，前者是一般的民歌，后者是“哭歌”，多在新娘出嫁或丧葬时唱。临高县民歌的形式更加丰富多彩，有“哩哩美”、“呐么哩”、“宾么哩”和“捶米调”、“拉帮调”、“啊罗哈”、“哎念句”（即哭歌）等。其中，新盈港的“哩哩美”尤为悠扬动听，闻名遐迩。各地的临高人，不论男女老少，对民歌演唱都很喜欢，很投入。我们到新盈港调查时，听说镇上一杂货店的女老板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歌手，就去拜访她，在店堂里说明我们的来意后，她兴致勃勃地把店里的话托付给另一店员，就邀请我们到楼上谈话，并让小孩把附近的一位男歌手请来，一起给我们表演民歌对唱，由于是即兴访问，我们没有带上录音机，她又主动地把自己的录音机拿来让我们录音。过一会儿，几位从附近农村来买东西的姑娘听到歌声后，便不请自来地循声找到楼上听对歌。我们随便地问：“你们也会唱吧”？她们很大方地说：“我们那里没有一个姑娘、小伙子不会唱的”。说罢，还自告奋勇地给我们唱了几首情歌。临高县木偶剧团团长王宗祥是一位年近花甲的老先生，我们特意请他来给我们介绍县里文化活动的情况，并讲一些有关临高县的掌故和故事。他也主动地给我们唱了几首民歌。此外，临高人非常喜欢看临剧和木偶剧。这两种戏都用临高语演唱，并用二胡、唢呐、锣、鼓等乐器伴奏。临剧的题材广泛，既有民间的故事传说，也有由汉族文学改编的剧目，如《西厢记》、《苏文秀》、《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临高的木偶戏由人和木偶同台演出，边跳边唱，题材更加丰富，形式灵活多变，颇具特色，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所以，除县里有临剧团和木偶剧团之外，几乎所有乡镇都有自己的剧团。群众在劳动之余，也常常唱民歌或者拿一件衣服套在锄头上当作木偶，在田边地头

演唱,自得其乐。在喜庆的日子里,村中老少咸来庆贺。亲朋好友都用民歌祝贺,主人也用民歌劝酒答谢,你唱我和,此起彼落,气氛热烈欢畅。客人往往流连忘返,唱个通宵达旦。可见群众对用本民族语言叙说、演唱的文艺作品是非常热爱的。

临高人是勤劳、机智、勇敢的民族,他们与汉族人民和睦相处,但对历代残暴的统治阶级却有着英勇抗争的优良传统。从汉朝至近代,事例甚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琼山、澄迈、临高等地的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经常配合琼崖支队抗击日军和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扫荡,掩护地下党员和革命领导干部。至今琼山的人民群众还津津乐道地讲述当年游击队划着小船,在沿海的港湾里钻红树林,与日军和国民党军队周旋的情况。临高人民也经常传诵着当年老县长符英华带领游击队打击日寇和革命老人黄金女赤胆忠心为革命,给地下党传递情报,护送战士和掩护革命干部的英勇事迹。

第二节 临高人的族源、族属 和临高语的语言系属问题

临高人有自己的语言,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并没有自己的民族称谓。因为他们说的不是汉语,所以海南人都把他们称为黎人或“熟黎”。一般人是这样说的,历代史志也是这么写的。以讹传讹,天长日久,连琼山和澄迈等地说这种话的人也有说自己“是黎人”,“说黎话”的。但在临高县,人们都不承认自己是黎族,而说自己是汉族,并认为自己说的是“汉语的另一种方言”或“本地话”(与客话——即海南话相对)。过去中外学者对“临高人”的族属和临高语的语言系属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除了上述的汉人、黎人、熟黎和黎语、汉语方言之外,还有说他们是历代从征而来的壮族士兵的后裔的。持“熟黎”说的,也有说他们是“汉化了的黎人”或“黎化了的汉人”两种不同意见。至于临高语的系属,有人说它与缅语接近;法国的萨维那神甫认为它是加岱语群中的一种语言;德国的民族学家史图博认为它可能是黎语和泰、汉语的混合语;而云维利则认为临高语“也许是客家

方言和北方话的一个混合语”。只有李方桂先生曾正确地指出黎语是台语支的一种语言,不过他并没有作详细的论述。

本书后面的章节将用对比研究的方法详细地分析临高语和侗台语族其他语言之间在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的异同和它们在发生学上的亲缘关系。这样我们就能够清楚地看到临高语既不是汉语,也不是黎语,更不是什么混合语。它是侗台语族台语支中的一个独立语言。在这里,我们首先着重研究、分析临高人的族源问题。

一、临高人既不是汉族,也不是黎族

1979年,在临高县为申请进行民族识别,要求恢复少数民族成分而召开的三级干部会上,有些人说“临高人”是汉族,不是少数民族。因为临高县林、谢、许、王等大姓都自称是从福建迁来的,其中有些人的族谱上还具体地说是从福建省莆田县甘蔗村迁来的。福建省没有壮、傣、侗、水等少数民族,所以他们必为汉族无疑。当时海南地区民委、临高县委和县府的领导为了解决这部分人的怀疑,除耐心、细致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外,还于1980年组织了一个调查组到福建省几个县去“寻根”。结果从各县县志和各姓氏的族谱中都没有找到什么可以证明“临高人”是从福建迁来的材料,莆田县从来就没有一个“甘蔗村”。关于族谱中类似的记载,据分析可能有下列几种原因:

1. 是出于伪托,明朝时文昌、琼海等地的汉人大修族谱,一部分“临高人”为了避免民族歧视,也跟着修族谱,伪托自己的先人是从福建搬来的。在临高、澄迈一带甚至有人出钱买姓,攀附大族,以免受到迫害的。所以族谱的记载并不可靠。

2. 也可能有个别家族的先人由于被贬或经商等原因,由福建或其他地方迁到临高人居住的地区,经过长期的共同生活,互相婚嫁往来而被“临高人”同化了的。但这部分人的数量肯定是很少的。否则,如果是数量众多的,生产和文化水平比较高的汉人聚族而居的话,是不大可能被同化的。东路各县和澄迈、儋县等地的汉族聚居区就是很好的证明。所以,即使有些姓氏在福建找到了“根源”,也不能据此否定“临高人”的民族成分。我们不应该把个别人的来源和民族成分混

为一谈,汉族和其他民族都不是由一个单纯的部族发展而成的。

谈到“同化”的问题,在我国的历史上,不论是在北方还是南方,少数民族被汉族同化是大量的,也是不必论证了的事实。但在局部地区汉族被少数民族同化的事实也是存在的。在历史记载中,因为迁徙、屯垦或被贬到边疆地区的汉族军民、官吏,天长日久,被当地占多数的少数民族同化了的也不乏其例,随文成公主入藏的工匠、侍从等人被藏化,都变成了藏人;又如唐朝宰相李德裕被贬并殁于崖州,其后人都变成了熟黎就是很好的例子。所谓“同化”,就是说某些人放弃了本民族原来的语言、风俗习惯而采用了在当地占主导地位的民族的语言、风俗习惯而被其他民族同化了。当然,他们也可能或多或少地保留本民族语言的某些成分(底层),或保留原来民族的一些风俗习惯。从文化特征和风俗习惯等方面来看,“临高人”和黎族的差别是比较明显的。黎族男人穿的包卵布或“吊铲裙”、妇女穿的缀有花边的开胸上衣和织花的筒裙以及纹面等风尚,在“临高人”中都没有发现。黎族人民敬畏“祖先鬼”,平时非常忌讳,闭口不提已故先人的名字,怕触犯祖先会给自己及家人降灾;黎族以十二种动物纪日(与汉族地支所用的动物不全相同),十二日为一周,哪一天是凶日,不宜耕作,不宜干什么等等,在生产和生活上的禁忌很多,“临高人”都没有这些风俗习惯。“临高人”受汉族文化的影响虽然较深,但有许多习惯还是与汉人不同的。例如女子出嫁后的头几年大都不落夫家,只在节日或农忙时由小姑等人接回去住一两天,待生养之后才到夫家长住等等。这种风俗与壮侗诸族相同,而跟汉族不同。所以“临高人”并不是汉化了的黎人,也不是黎化了的汉人,更不是泰族和黎族、汉族形成的混血种族。那么,史志上经常提到的,分布在这一地区的“熟黎”指的是什么人呢?我们认为“熟黎”是一个含混的称谓,它可能包括下面几种人:

(1) 福建、两广的汉族移民

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百四,广东八:“熟黎,洪武初年归附,报在西路临高等界,则乡音与广西思、梧等处相同:东路琼、澄

等界，则与福建漳、泉等处相同”。《明史》卷三百一十九：“熟黎之产半为湖广福建奸民亡命，及南、恩、藤、梧、高、化之征夫”。又清张崧《崖州志》卷三十，黎防志一也说：“熟黎与半熟黎，初皆闽商，荡货亡命为黎，亦有本省诸郡人，利其土，乐其俗而为黎者。”所谓奸民亡命都是当时统治阶级对汉族移民中劳动人民的污蔑。历代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反抗经常交替使用征剿与怀柔两种手法，生黎不供赋役，熟黎则视情况而定，“有纳粮当差之峒，有纳粮不当差之峒”。明朝对海南黎族的镇压非常频繁，糜费甚多，经常横征暴敛，汉族人民的生活也非常困苦，加之当时有些抚黎官员为了跟州官、知府争权夺利，对靠近黎山的汉族移民“诱以不当差役”，让它们“报作梗化黎人”。所以福建、两广移民为了逃避差役而报作黎族的人甚多。从上述情况来看，我们就不难判断顾炎武等人所谓的“乡音”指的是汉族移民所说的汉语方言。福建和广东潮汕的移民多居东路文昌、琼山一带，所以“乡音”与福建漳、泉等处相同，两广的移民多住西路临高、儋县等地，“则乡音与广西思、梧等处相同”。直至今日，文昌、琼山等地居民大都说海南话（与闽南话基本相同），而儋县、昌感部分地区的居民仍说军话（军话即从征而来的湖广“征夫”所说的话，与西南官话相近，故《感恩县志》卷一说：“军话与正音相通”）；儋县以儋州话为主（儋州话与粤方言相近）。顾炎武等人使用“乡音”一词，也说明他们能听懂，至少也认为这是汉语方言，而不是“以唇舌杂为音声，殊不可晓”的少数民族语言。

（2）汉化了的黎族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二：“黎人半能汉语，十百为群，变服入州县圩市，人莫辨焉，日将晚，或吹牛角为声，则纷纷聚会，结队而归，始知其为黎也。”从地理分布等情况来看，周去非所谓的熟黎、黎人可能大部分都是被误作黎人的“临高人”。但在元、明时黎族人民的分布比较广，被称作“熟黎”的人中，也可能有一部分是真正的黎族。后来由于封建统治日趋严密，熟黎也和齐民一样要纳粮当差，报作黎族已无利可图，同时为了避免民族歧视，那些已使用汉语的黎族和“临高

人”这时大都改报汉族,所以现在海南岛东路各县黎族的人口已经很少了,只有万宁、乐会等地保留黎族语言和特点的人仍报黎族。

(3) “临高人”

唐朝以前,海南岛的汉人不多,东路各县,包括文昌、琼海、万宁和陵水等地大都是“临高人”的住地。在宋、元时,“湖广福建奸民亡命及南、恩、藤、梧、化之征夫”尚且落籍报作“黎族”,那么,语言、风俗习惯与汉族原来就不相同的“临高人”被史志称为“黎族”的就更不为奇了。但后来汉族移民日益增加,当地的“临高人”逐渐地被汉族同化,同时由于官府的政策已经改变,熟黎也要纳粮当差,报作黎族不但无利可图,还会受到歧视。这时候东路文昌、崖县等地已经改用汉语,基本同化于汉族的那些“临高人”都纷纷报作汉族,只有琼山、澄迈、临高等地仍保留自己的语言、特点的“临高人”还被汉人称 loi kia? “黎仔”或 loi naŋ “黎人”。我们可不能望文生义,把这些“临高人”当作真正的黎族。

二、“临高人”不是从征而来的壮族军队的后裔

临高语既然跟台语支的壮语比较接近,历史上又有从广西征调侬、壮、土、目军兵到海南岛镇压黎族人民起义的记载。那么,“临高人”是从征而来的壮族军队的后裔这种推论是很有诱惑力的。但我们只要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就可以看出这种推论是不正确的。从历史记载来看,最早从广西调兵镇压黎族人民的似乎是从南宋开始的,明章潢《图书编》:“宋绍兴(1131-1162)中,黎王文满连结西峒王承闻等攻破南砦,复犯省地,广西兵发,烧毁巢穴,生擒黎贼,乱遂定。”这次发兵是广西的汉族军队或者是壮兵并没有明确记载。后来,宋室衰微,内忧外患,自顾不暇,对海南用兵不多。史志上明确地记载使用广西侬、壮军兵到海南镇压黎族人民的始于明朝中叶,而且次数较多,但根据历史记载,每次镇压之后参加征剿的侬、壮、土、目军兵大都遣返原籍。例如明朝的王佐是临高县博后乡人,成化(1465-1487)初授高州同知,当时御史韩邕用兵两广,王佐曾献策平戎,他的《进〈珠崖录〉奏》就是向明王朝建议如何整顿海南吏治,以便更好

地治理生、熟黎人的。他的《平黎记》是记述明孝宗派毛锐为大将统率“两广官校暨汉达徕兵以十万”镇压黎族人民起义经过的。王佐的故乡临高和琼山、澄迈、定安等地都是用兵之地，他对当时的情况是了如指掌的。他在文中说：“不再越月而班师奏凯”。如果当时或较早的时候有徕兵或土兵留下屯守的话，王佐是不会不记录或提及的。又如欧阳必进《剿平黎贼查核功罪以明赏罚疏》中也明确地说：“择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四月初三日将各土官目兵掣散，量留海南雷州神电卫所汉达官军打手人等，分布防守。”从明朝中叶至今不过四五百载，即使从宋绍兴算起也不过 800 余年，如果有大量壮族军兵留戍海南的话，史志上必然会有不少记载，但稽诸史籍并没有这类记载。如果“临高人”的先民真是明朝中叶从征而来的壮族军兵后裔，即使他们跟当地的汉族、黎族人民接触较多，他们的语言与广西壮语的差别也不会这么大的。我们可以拿同一时期从征而留在海南的苗族作一比较。据清道光《琼州府志·海黎志》记载：“儋州又有苗黎，凡十村，约九十余家，男妇不满千人，盖前明时剿平罗活峒叛黎，建乐安城，调广西兵防守，号药弩手，后迁居于此，即其苗裔也。”又清张崧《崖州志·黎防志一·黎情》载：“又一种曰苗黎，凡数百家……盖前明时剿平罗活、报由二峒，建乐定管，调广西苗兵防守，号为药弩手。后营汛废，子孙散居山谷，仍以苗名，至今犹善用药弩。”据 1954 年统计，海南岛的苗族约有 1.6 万余人，分布在岛上的 10 多个县，其中散居在黎族苗族自治州的有 1.19 万人。岛上各地的苗语非常一致。他们的语言与广西自称“金门”的瑶语几乎完全相同。1956 年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二工作队海南苗语工作组到海南调查时，组内有一位广西自称“金门”的瑶族姑娘，她可以非常顺利地用自己的母语跟当地的苗族通话，此事曾轰动一时，工作组每到一地，附近的苗族人民来探访或邀请她前往作客的络绎不绝。但临高语跟壮语的差别却比较大，同源词的比例低于壮语和布依语、傣语之间的比例，在我们调查过程中，无论用壮语北部方言或南部方言与“临高人”通话都很困难。所以，从历史记载、从语言差别之大来看，“临高人”

都不可能是明朝中叶或南宋时从征前往而留在海南岛的壮族军兵的后裔。“临高人”应该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大家庭中具有悠久历史的一个民族成员,是我国百越子孙的一部分。

三、关于“临高人”的族源和迁徙问题

“临高人”既然是我国古百越民族后裔的一部分。那么,“临高人”的先民究竟是什么时候和从什么地方迁到海南岛的呢?在迁去之前,他们跟哪些民族的先民关系更密切呢?对这些问题,由于文献、历史没有什么明确的记载,所以我们只能结合历史、文化、语言和壮侗诸族目前的地理分布情况及地名学等资料来进行研究和探索。据我们的研究,“临高人”和我国壮侗诸族一样,均源于古百越民族集团中的西瓯和骆越这两支语言、文化互相接近,在地域分布上稍有不同,但又往往交错、重叠的种族集团。其实,在距今四五千年以前,西瓯、骆越内部就已经形成了好几个在语言、文化等方面大同小异的集团。其中,源于西瓯的操壮语北部方言和布依语的先民分布在广西中部、北部,贵州南部和云南东部偏北地区;源于骆越操壮语南部方言和傣、泰、老、掸等语言的先民分布在广西南部、云南东部偏南和越南北部的一些地区;操侗水诸语言的先民则分布在广东西部和广西东部地区。其中,操侗、仡佬、拉珈和标语的先民分布在沿西江的肇庆、怀集、梧州一带;操水、毛南等语言的先民分布在南边的滨海地区^①。而“临高人”和黎族的先民正好分布在壮泰诸族和侗水诸族之间,“临高人”的先民住在靠北的地区,黎族的先民则住在雷州半岛一带的滨海地区。大概在新石器时代末期(约5000年前),黎族的先民就从雷州半岛越过琼州海峡迁到海南岛北部一带,并在那里居住了相当长的时间,至今在岛北各地还留下一些黎语的地名。在黎族先民迁往海

① 侗水诸族是随唐时才逐渐由广东西部、广西东部沿海地区向北迁到湖南、贵州和广西交界地区的,傣、泰、老、掸和阿含诸族也是在秦朝、唐朝和宋朝几次移民浪潮中逐渐西迁,慢慢分散到云南和泰国、老挝、缅甸和印度等地的。详见梁敏《侗泰诸族的源流》,刊于《中国民族史研究》,第一集。又见梁敏、张均如《壮侗语族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96年5月,北京。

南岛之后,原来住在广西中部地区的“临高人”先民则南下占据黎族先民原来居住的地方。大约在 2500 年前(约在春秋战国之际),他们也沿着黎族先民走过的路线迁往海南岛北部,而原先住在那里的黎族人民则逐渐迁入五指山区。当然,也有一些“临高人”的先民可能是后来陆续迁往的,例如南朝梁、隋之际,出生在广东西南部高凉郡的冯洗氏,据史学家考证为当地俚人,当时她雄据粤西、桂南和海南岛大部分地区。隋文帝为了表彰她除暴安良,维护国家统一之功而封她为谯国夫人,赐给她临振县汤沐邑 1500 户,并任其子冯僕为崖州总管。当时从广东西南部和广西东南部迁去的俚人也不少。由于他们的族属、语言基本相同,后来都跟“临高人”的先民融合了。

有关“临高人”从大陆迁往海南的证据:

(1) 西汉元封元年(公元前 110 年)汉武帝攻占海南岛设立儋耳、珠崖郡的时候,“临高人”的先民早就定居在海南岛北部一带,而且农业、手工业的生产已达到相当水平了。故《汉书·地理志下》记载当地居民的情况时说:“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男子耕农,种禾稻纡麻,女子桑蚕织绩。亡马与虎,民有五畜,山多麋麇,兵则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为鏃。自初为郡县,吏卒中国人多侵凌之,故率数岁一反,元帝时遂罢弃之。”有人说这段话描述的可能是黎族先民,而不是“临高人”先民当时生产和生活的情况。非也,因为根据史志的记载,珠崖郡治原设今琼山县遵潭镇东潭乡,儋耳郡治原设今儋县三都镇南滩乡。遵潭一带向为“临高人”的住地,三都也离临高县不远^①,南滩的“南”字,史书上都写作三点水旁,这分明是“临高

① 《读史方輿纪要》卷一百五,广东六,琼山县:“府东南三十里,即汉朱崖郡也。茂陵书,朱崖治潭都,去长安七千三百二十四里。元初中废,后汉亦为珠崖县治,后复废,梁置崖州及珠崖郡,治义伦县。或曰州初治此,后徙义伦也。唐置琼山县于今治,自是州郡皆治焉”。

清道光《琼州府志》,卷六,建置志一,城池:“儋州,汉儋耳城,在旧宜伦县高麻都滴滩铺,楼船将军杨僕所筑,仅二百六十步,高一丈四尺,唐初置州,始徙高坡,即今治(去滴滩铺旧址三十里),宋元因之。”

人”和壮傣诸族的地名冠首字，“滴”是“水、河”的意思^①。所以南滩一带过去一定是“临高人”先民的住地。此外，“桑蚕织绩”是临高人的传统副业^②。而直到本世纪五十年代我们进行黎语调查时，黎族人民还没有人从事种桑养蚕的。《桂海虞衡志·志器》一节就说：“黎幕出海南黎峒，黎人得中国锦綵，拆取色丝，间木棉挑织而成，每以四幅联成一幕”。《峒溪纡志·黎锦》也说：“黎人取中国綵帛，拆取色丝，和吉贝（作者按——即棉花）织之，成锦”。直到1957年我们到通什、保城等地调查时，看见织锦的妇女还像她们的老祖宗那样买各种颜色的绸布来拆取丝线。如果黎族人民擅长蚕桑，干吗要买锦綵而拆取色丝呢？“临高人”的先民从大陆迁来时就带来了壮侗诸族比较先进的织染技术，临高话的织布机叫 dək⁸，卷纱筒叫 lut⁷，线叫 moi¹，蓝靛草 tɕ¹ tsam²，跟壮语都是同源词。当时“临高人”先民的织造技术已相当高明，织出的广幅布很受汉王朝的赏识^③。黎族人民虽然能够织出很精美的筒裙、头帕等织品，但他们用的织机却非常简陋，五十年代我们在黎族地区调查时，在琼中、保亭一带看见的织机只有一些涤带、木片、竹棍之类的东西，织布的妇女把这些涤带的一端系在一株树的根部，另一端栓在自己的腰上，人离树三四尺左右，伸直双

① 黎族“水”叫 nom³，读音与“滴”也差不多，但黎语很少以“南”为地名冠首字。以 nam⁴“水、河”为地名冠首字的要数壮语和临高语最常见。壮族地名多用“谿”字表示，而“临高人”地名则多用“滴”字表示，如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四，《水语·“滴”》说：“琼山县西北二里下田村有第一水，桥名滴一，又一里有第二水，桥名滴二，又三里水，桥名滴茂，其南十六里有滴潭溪，西南六十里有滴天桥。澄迈有滴滚泉，有滴渚上郡，滴蒙陂，滴坑陂，滴滢温泉。定安有滴白江。儋州有滴滩港，滴滩市。万州有滴陵山，滴陵水。崖州有滴漏岭，滴西岭。滴之称，唯琼独有，他处无之。”从“滴”字地理分布之广来看，也可以证明过去“临高人”分布的地区要比现在广阔得多。《广东新语》清屈大均撰，木天阁刊本（二十八卷）。又清康熙刊本（二十四卷）。

② 《临高县志》卷三记载：“妇女业蚕桑，司纺织。……田畴错壤，桑麻薊薊，皆可耕可织。一夫力耕，岁可得米一百斛，一妇纺织，年终得赚三匹。所谓临高丝者，其货可居也”。《临高县志》，清聂辑庆修，桂文熾等纂，光绪十八年刻本。

③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武帝末，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蛮不堪役，遂攻郡杀幸。”

腿席地而坐,利用身躯一俯一仰的活动使涤带和经线一弛一张,同时熟练地用竹棍挑起部分经线,然后把卷有纬线的“梭子”穿过去,再用木片把纬线压紧。周而复始,随着布幅的加长,一串美丽的花纹便织出来了。我们真为他们高超的技艺所倾倒,但也为这种过分简陋的机具而叹息。当时还以为歧黎地区的生产比较落后所以没有像样的织机,后来看到德国民族学家 H. 史图博的《海南岛民族志》,才知道各地黎族的纺织机具都是那么原始的。史图博在书中是这样描述的:“白沙垌黎……织机是极其简单的,……织布的妇女是伸直脚,坐在铺在地上的棕榈叶或席子上织的”。“……黎族妇女是极其擅长于纺织和刺绣的,但织机却是令人惊奇的那么原始”。在 1982 年广东民族研究所编写的《广东少数民族》第 11 页也说:“黎族妇女用简单的工具,纺织出日常穿用的头巾、筒裙、被单、花带等织品”。书中并没有使用“纺纱机”、“织布机”的名称,而只说“简单的工具”,大概也认为它们还够不上“机”的标准吧!用这样简单的机具只能织出一尺来宽的织物,而不可能织出“广幅布”来的。这也充分证明《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的是“临高人”先民,而不是黎族先民的情况^①。

(2) 在海南岛琼山县、昌化县和感恩县等地都曾经有“铜鼓”出土^②,铜鼓是西瓯、骆越和俚、僚所贵重的器物,在广西出土的就达 500 多个。黎族迁往海南岛的时间太早,可能还没有铜鼓,所以在五指山黎族地区也从来没有发现。这些铜鼓可能是“临高人”先民(更可能是洗夫人的部属)从大陆带来的。

(3) 据《汉书·地理志下》记载,海南岛从来没有老虎,而澄迈、琼山一带的临高语中不但有老虎一词,而且跟壮语南部方言的 ɬu^1 和僚语的 sə^1 、泰语的 suə^1 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肯定是同源词(壮语北部方言和布依语管老虎叫 kuk^7)。又如临高语的地名冠首字除跟

① 见梁敏《黄道婆究竟向谁学艺?》,刊于《民族研究》1990 年第 3 期。

② 见清乾隆及道光《琼州府志》,杂志,金石。

见民国周文海《感恩县志》,杂志,金石。